



「四教儀集註」與蒙潤大師

張秉全

天台智者大師，靈山親承，大蘇妙悟，依龍樹之心傳，循法華之妙旨，立五時、八教，判釋東流一代聖教，罄無不盡。五時：一、華嚴時，二、阿含時，三、方等時，四、般若時，五、法華涅槃時。八教：(甲)化儀四教：一、頓，二、漸，三、秘密，四、不定。(乙)化法四教：藏、通、別、圓。

五代時，高麗國(今韓國)沙門諦觀，依大部之旨，錄出「天台四教儀」二卷，扼要地列述五時，八教內容及其斷惑修證位次。明沙門智覺在「四教儀緣起」中說：

「觀能探索大本，錄出「四教儀」之文，成二卷，其上卷明一家判教之義，下卷明南北諸師宗途異計(不同觀點)……但行今上卷之文者，蓋由辭句簡要，義旨易明，學者誠資之，可了其化之大綱，豈曰小補之哉。」馮夢楨在「刻天台四教儀引」中也說：

「『四教儀』言約義該，實為台教之關鑰，學者了此，則一

化之大綱，思過半矣。」對「天台四教儀」推崇備至。

歷來為「四教儀」作註者有：「四教儀集解」三卷，宋從義撰。「四教儀備釋」二卷，元元粹述。「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」二十卷，性權記。上列各書，有的失之太畧，有的徵引過繁，均不便初學。元蒙潤大師有鑒於此，乃集成「四教儀集註」一書，他在序文中說：

「自昔至今，註釋者衆，或畧而不備，或博而太繁，矧又節去正文，但標初後(之文)，苟非精誦者，莫之能閱也。」前人之註解，或太簡畧，或過繁蕪，閱者不便，而且不錄徵引全文，只錄其開首結末之文，如果對經文不熟或拙於記誦之人，確乎難於披閱的。蒙潤為便初學，節錄諸部(輔行、釋籤、妙玄、文句、止觀、妙樂、妙宗等)之文一一彙集，註於「四教儀」正文之下，蒙潤在序文中說：

「今集諸部之文，註於其下，將無便於披覽者歟？」這樣確

實對閱讀者方便得多了。因此『四教儀集註』一出，學者咸皆奉為圭臬，其餘各家註解，遂隱而不彰，絕少問津者矣。

蒙潤，字玉岡，浙江海鹽人，俗姓顧，父名敏，乃一隱君子也。母孫氏，乃其師古源法師甥女，潤十四歲，在郡之白蓮寺，依古源法師出家，方禮伽藍神時，土偶皆扑，一象驚異，古源授經令讀，未幾遍即成誦，遂命從祥公祝髮，受具戒，古源見其穎敏，授以『天台止觀』、『金剛錮』、『十不二門』諸書，咸能明其旨趣。未久，古源歸寂，潤師事竹堂傳法師，因苦學嬰疾，修『請觀音懺』十七日，疾遂愈而心倍明，任杭州南天竺演福寺第一座（首座）未幾，出主海鹽德藏寺，日講『法華』象集千指，精誠感孚地方，屠、酤為業者咸改從他業。後遷主演福寺，宗風大振。六年退院事，居龍井風篁嶺之白蓮庵，專修念佛三昧，依者日衆，宣政院（乘按：官署名，元置，掌管釋教僧徒之事，長官為院使）宣命，令潤主天下竺，固辭不可以起，寺方被燬，惟普賢殿依然獨存於焦土瓦礫中，潤慨然謂衆曰：「此寺成於慈雲，（即宋遵式大師）今殿尚存，祖師願力有在之徵也，乃為次第葺治一新。朝夕講說，畧無倦容，嘗率衆修『法華三昧懺』感普賢菩薩放光，現諸瑞相，住寺三載，一日，呼門弟子實法、明策等，示以止觀安心之旨，而已告曰：「吾世緣盡於今時。」驟稱佛號數百聲，泊然而化，時在元順帝至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。壽六十有八。

潤生平修持精進，晝夜無怠，常行般舟三昧（按修此三昧，常行不坐，旋繞念佛）以九十日為一期，凡七期，修『法華』、『金光明』、『大悲』、『淨土』諸懺，以七七為期者，則不可悉數。

（上接第35頁「不落窠臼·獨創新制」）

此外，隨着懺法的發展而舉行的法會也多起來，而且五花八門，漸次成為中國佛教僧伽組織的行事儀規之一。梁武帝創制的而對後世有較大影響的就有所謂「水陸法會」和「盂蘭盆會」兩種。水陸法會又稱水陸道場，是中國佛教經懺法事中最隆重的一種。宋宗鑒「釋門正統」卷四說：「所謂水陸者，因梁武帝夢一神僧告曰：『六道生死，受苦無量，何不作水陸普濟羣靈？』帝因（寶）志之勸，搜尋貝葉，早晚披覽；及詳阿難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，用制儀文，遂於潤州（今江蘇鎮江）金山寺修設，帝躬臨地席，命僧佑禪師宣文。」然其事既不見於慧皎所撰的「高僧傳·寶志傳」，也不見於僧佑「出三藏記集」、「弘明集」等著作中，惟初唐長安法海寺僧道英，自稱得到了梁武帝創制水陸法會的儀文，遂再與水陸法會，但有唐一代，作水陸法會的並不多，至宋才風行於全國。盂蘭盆會，又稱盂蘭盆節。「盂蘭盆」，梵文 *Ullambana* 的音譯，意為「救倒懸」。盂蘭盆節是根據兩晉竺法護譯「佛說盂蘭盆經」中舉行超薦歷代先祖而做佛事的故事而來的，該會常在每年七月十五日舉行。據「佛祖統記」卷三十七云，大同四年（五三八），梁武帝赴同泰寺，設盂蘭盆齋。自此之後，歷代帝王以及百姓，相習成風，更成為我國寺院中重要行事之一。元代德輝撰寫的「敕修百丈清規」卷七「節臘章·月分須知」中說：「七月初旬，堂司預出盂蘭盆會諸寮看誦清單，預牽衆財辦斛食供養，十三日散楞嚴會，十五日解制。當晚設盂蘭會，訊經施食。」這是梁武帝創制的最有影響，又具有羣象性的佛事制度之一。

以上這些規制，以後經過歷代封建王朝的提倡和利用，使佛教在中國這塊土壤裏深深地扎下了根，尤其是為佛教僧制中國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